

從「歐洲解放者」到「歐洲最落後的民族」 —— 14 至 18 世紀波蘭國家及民族形象 在全歐的轉變

杜子信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摘要

1386 至 1696 間的波蘭-立陶宛聯盟暨後續的波蘭王政共和國，曾經主宰歐陸東半部的政局達 400 百年之久，此一歷程中，透過對不分強弱的全體貴族權益的集體保障，及對各支宗教派系信仰的寬容對待，使得其國勢在各方來歸及所屬成員誠心依附的狀態下，得以蒸蒸日上，逐步建構起其於中東歐至東歐世界的霸主地位。亦因此故，使得此一國度至 15-17 世紀之時，先後在歐洲各界之中為自身博得諸如「沒有火刑架的國度」、「歐洲解放者」及「土耳其尅星」等讚譽，不難看出其時此一國度威名遠播的盛世氣象。然而進入 18 世紀初期之後，過去厥為建構波蘭國勢興盛的兩大關鍵要素：貴族權益至上及宗教信仰寬容，因百餘年來的流弊叢生及遭到破壞，卻因囿於各方私心自用而未能及時匡正，終使此一國度迅速在國際場域上遭到各層面的嚴重打擊，無論就軍事、政治、宗教及輿論界等皆然，最後導致波蘭王政共和國的形象短短數十年間由正轉負，致而產生出「全歐最落後的民族」、「每一層面皆低賤的民族」及「波蘭式經濟」等等負面標語，成為此一國度在步向亡國歷程中的鮮明標記。本文將就波蘭-立陶宛暨後續的波蘭王政共和國的外在形象轉變為題，分析其由正至負轉變之關鍵，以及其間歷程中何以此一國度難以力挽狂瀾而重回正軌的深層因素之所由。

關鍵詞：波蘭-立陶宛聯盟、波蘭王政共和國、波蘭黃金時代、負面波蘭觀

壹、前言

從中古（Middle Ages）晚期一直到早期近代（Early Modern Ages）的末葉，即由 15 世紀前期至 1696 年為止，波蘭王國及後續的波蘭王政共和國誠可謂為歐陸強權之一，整整超過 250 年的時間中，這個國度主宰著廣大的中東歐至東歐大陸，在涉及歐陸，尤其是歐陸東半部的國際事務上，該國全然扮演著主導者的角色。在該國全盛時期的兩百餘年間，週遭國度如莫斯科公國及日後由其轉變而來的沙俄帝國、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以及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最初皆難以在中東歐至東歐大平原上與之相抗衡，更遑論直至 1660 年前仍隸屬於其下而作為其藩屬的普魯士。

自從 14 世紀前期開始，歷經了近 200 的大分裂亂局而終於再次獲得統一之後的波蘭王國「皮雅斯特王朝」(*Piastowie, Piast Dynasty, 966-1370*)，大舉勵精圖治，革除弊端陳疴，並引入大批專業的德意志及西歐移民入境，進行大規模疆域開發之後，使得波蘭國勢逐步蒸蒸日上。這段在史書上被稱之為「皮雅斯特王朝的中興紀元」之期，為波蘭王國國勢的崛興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其後基於攜手共抗強敵之故，波蘭王國乃於 14 世紀末期與立陶宛大公國進行王室聯姻，建立起新的王朝，是為「雅捷佛王朝」(*Jagiellonowie, Jagiellonian Dynasty, 1386-1572*)，兩國同時並締建政軍同盟，此即波蘭-立陶宛聯盟。兩大強權的聯姻締盟，逐步從 15 世紀前中期開始，先後重創了北方的德意志騎士團（條頓騎士團）國家、東方的莫斯科公國及南方的鄂圖曼土耳其帝國，造就了波蘭-立陶宛聯盟獨霸歐陸東半部及全盛時期。其後進入 16 世紀前期，隨著歐洲各地爆發「宗教改革」及隨之而來的血腥宗教戰爭之後，波蘭國度卻以採行宗教寬容之策而成為全歐受迫害的不同教徒的棲身之所，遂為其博得宗教迫害避難所的美名。藉由上述歷程中，亦逐步塑造起波蘭國度在全歐輿論界的崇高美名，波蘭王政共和國所享有的盛名甚且一直延續至 17 世紀後期而不減，當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在其時發動其新一波的歐陸大攻勢，試圖一舉拿下中歐鎖鑰城市奧京維也納，進而欲將伊斯蘭大纛插在歐陸心臟地帶之際，亦正是倚賴波蘭盛世最後一位英主楊三世·索別斯基親率大軍，千里馳援，終而

大破鄂圖曼土耳其大軍於維也納城下，盡解歐洲基督教文明的存續危機，從而為波蘭贏得了「歐洲解放者」的頌揚。

然而波蘭國度兩個多世紀以來所享有的盛世聲譽，卻僅僅歷經不到 20 餘年的時間即折損殆盡，由於波蘭貴族在楊三世·索別斯基過世後的不復可制、中央王權的虛化衰凌及波蘭天主教教會的步向宗教狂熱等因素，使得進入 18 世紀之後，在全歐輿論界中就出現了所謂「負面的波蘭觀」（*negatives Polenbild*）的印象，波蘭國家及民族至此逐步淪為全歐各界痛斥醜詆的對象，甚至被冠上「全歐最野蠻的國度」及「歐洲最落後的民族」之稱謂。此種發展使得波蘭王政共和國在 18 世紀末期的橫遭三度瓜分而淪亡的歷程中，無法喚起任何國際同情的力量，終難挽回波蘭遭支解而亡國的悲劇。

究竟波蘭國度如何從一個長達兩百多年間享有高度威望的中東歐強權，竟幾乎在一夕之間，使其形象由正轉負而成為全歐各界詛咒痛斥的落後政權？其間此一國度各層面的運作究竟發生了何種的變化，致而使其形象發生急劇的轉變，本文將作深入分析。

貳、10 至 14 世紀初之間波蘭國度的建構、大分裂、再統一及東進

波蘭國度地處中歐，其語系則隸屬於廣大的斯拉夫語系（*Slavic languages*）的西支，因此波蘭人與週遭的捷克人及斯洛伐克人同屬於西斯拉夫語系（*Western Slavic languages*）族群，這 3 支西斯拉夫人的進入今日中歐之地，皆是在中古初期，即約在 6 至 7 世紀以後的事（*Schreiber, 1984: 10*），這是廣大斯拉夫語系族群分衍後所形成的結果。斯拉夫諸部族（*Slavic tribes*）最初的棲息地，原在歐陸東部的普里佩特沼澤區（*Pripet Swamp*）至喀爾巴阡山（*Carpathian Mountains*）東緣之地，隨著 4-5 世紀間，原居於今日中東歐及東歐大平原上的東日耳曼諸部族（*Eastern Germanic tribes*），諸如哥德人及汪達爾人等西遷南移之後，斯拉夫諸部族在後續兩個世紀間就陸續移入了此一空曠地帶，並自此之後因族群繁衍

及地理區隔之故而逐步分衍成西、南、東 3 大支斯拉夫語族，而分佈範圍位於最西方的族群，日後就逐步分衍為西斯拉夫語系的 3 支民族。

一、波蘭大公國的統一、擴張及分裂內戰

朝西遷徙的西斯拉夫部族中位於最北端的各支部族，歷經 3 個世紀以上的混戰兼併後，時至 10 世紀中葉時，散居於奧德河（*Odra, Oder*）及維斯瓦河（*Wisła, Vistula*）之間的西斯拉夫諸部族，最大的波蘭部族（*Polanie*）在首領米耶茲寇一世（*Mieszko I., 960-992*）的領導下，成功兼併諸部後逐步走向統一國度，隨即建都於格尼茲諾（*Gniezno*），並在 966 年正式皈依基督教後，締建波蘭史上的第一個王朝：波蘭大公國「皮雅斯特王朝」（*Halecki, 1963: 20*）。其後此一國度至其子「勇敢」波列斯瓦夫一世（*Bolesław I the Brave, 992-1025*）在位時，進入全盛時期。在其任內，大幅向外擴張波蘭疆域，至 11 世紀前期之時，已然將原先以奧德河流域的格尼茲諾及波茲南（*Poznań*）為中心的大波蘭（*Wielkopolska, Greater Poland*），大幅度地向南延伸至維斯瓦河上游以克拉科夫（*Kraków*）為中心的小波蘭（*Małopolska, Lesser Poland*），以及向東擴及維斯瓦河中游以普沃次克（*Płock*）及華沙（*Warsaw*）為中心的馬佐維亞（*Mazowsze, Mazovia*），其疆域約莫與今日波蘭國家的版圖相當。

然而進入 12 世紀前期之後，由於皮雅斯特家族不同世系分衍繁多，為爭奪波蘭大公之位，漸生爭端。終至 1138 年「歪嘴」波列斯瓦夫三世（*Bolesław III Wrymouth, 1107-38*）在任時，作出在對外維持一個完整的波蘭大公國的架構下，內部進行實質分割統治的政治安排，此舉將大公國一分為五，由「歪嘴」波列斯瓦夫與其 4 子分而治之，至於波蘭大公之位則改採兄終弟及的方式，預計待其過世後則由其諸子依序接任之。然則此種安排反使其諸子為盡速奪得大公之位，在其甫一過世未久旋即爆發軍事衝突，內戰於焉爆發。其後此一內戰綿延甚久，歷時幾達 200 年之久（1138-1320），史稱皮雅斯特王朝「大分裂」（*rozbięcie dzielnicowe, Fragmentation*）。

of the Realm)，波蘭大公國致而深陷中央衰頹及全境分崩離析的惡果（Augustynowicz, 2010: 35-37）。

二、中古高峰期的德意志人東向移民拓殖行動及波蘭西部的德意志化

此一歷時幾達 200 年的內戰，最重要的影響在於造成波蘭西部及北部版圖的大幅流夫，係因西鄰德意志神聖羅馬帝國境內的東部封建領主強藩們，利用波蘭各分裂邦國仍持續不斷進行內部分割統治所造成的領域碎裂化之機，遂藉由政治聯姻而逐步影響甚至掌控了波蘭西部各小邦（Rogall, 1996: 50）。其後且因 13 世紀初蒙古西侵風暴後所導致大量丁口淪喪的背景，大批德意志移民受波蘭各領地統治者之邀而入境實邊墾殖，此即「中古時期的德意志人東向移民拓殖運動」（*Niemieckie osadnictwo na Wschodzie, Medieval German Eastern Migration and Colonization*）（Higounet, 1986: 172）。誠然此類移民帶來各類先進的農商礦技能，促進了 13 世紀波蘭各地的大規模開發及經濟發展，但卻也因移入的德意志人數量過鉅，導致波蘭西部各地區的族群結構從量變而產生質變，遂使 13 世紀中期之後，波蘭西部的各領域，西利西亞（*Śląsk, Silesia*）、波美拉尼亞（*Pomorze, Pommerania*）等皆逐步進入了「德意志化」（*Germanizacja, Germanization*）的境地（Augustynowicz, 2010: 37）。此外，北方濱臨波羅的海地帶，亦因長期割據波蘭北部的馬佐維亞公國引入了德意志騎士團/條頓騎士團（*Zakon krzyżacki, Teutonic Order of Knights*）入境，作為助手而使其征服波羅的海異教徒古普魯士人（*Prusowie, Old Prussians*），未料此舉種下出乎預料之外的後果，最後導致此一「驅虎吞狼」之策，反造成「養虎貽患」之禍，德意志騎士團在全面征服古普魯士人之後，隨即據地稱雄並建立起一個武裝修會國度：「德意志騎士團國家」（*Pánstwo zakonu krzyżackiego, State of Teutonic Order of Knights*），隨即號召大批德意志移民入境屯墾開發，造成該地同樣逐步進入「德意志化」的歷程（杜子信，2019: 140-44）。於是自此之後德意志騎士團國家逐步發展成為波羅的海地區的強權，為時

近達 200 年之久，成為波蘭國度北方長期的邊防大患，直迄 15 世紀初始告終結（Boockmann, 1999: 92-94）。

總而言之，波列斯瓦夫三世將波蘭大公國 1 分為 5 的分割統治之舉，對於日後波蘭及中東歐地區歷史的影響甚大，首先它導致了波蘭西部領域的劇減，儘管日後皮雅斯特王朝在末代兩位英主上台後能夠達成波蘭全境的「再統一」，不過其西部故土再也無法收回，直迄 20 世紀中葉為止。因此自從 14 世紀中後期開始，再統一之後的波蘭皮雅斯特王朝就朝向歐陸東部發展，於是中古後期以後的波蘭國度逐步發展成為一個中東歐及東歐地區的強權，此一發展，當然與波列斯瓦夫三世對波蘭全境內所實施的分割統治之策息息相關。

三、波蘭的再統一及東進行動的開展

值得一提的是，儘管中古高峰期大批德意志人移入波蘭西部北疆，而造成若干地區逐步因族群結構轉變而質變成為日後德意志世界的一部分，然而無可否認的是，德意志人的東向移民拓殖行動亦對波蘭大公國各地的政、經、社、文發展，帶來正向發展。皮雅斯特王朝自 14 世紀初完成「再統一」大業並正式晉升成為王國之後，全境各地頗得利於過去近 200 年以來德意志移民於波蘭各地所導入的先進農耕的運用、大批城市的建構、商業網絡的打造，以及貴重金屬的開採，使得各地皆普獲開發之利及促進大量丁口滋繁。甚至今日若干波蘭史家亦不吝讚揚這段時期，為波蘭歷史上的所謂「13 世紀大躍進」（*Przełom XIII wieku, Thirteenth Century Breakthrough*）之期，為爾後波蘭國勢的再起奠定了極為重要的基礎（Zientara, 1982: 34-35）。

於是 1320 年皮雅斯特王朝在「肘長」瓦迪斯瓦夫一世（Władysław I Łokietek, 1320-33）統治下，甫完成「再統一」大業之後，毫無疑問地立即運用上述所列之各類豐厚利基，逐步將之轉化為政治軍事的資本。尤其在其子（即皮雅斯特王朝中興英主亦是末代君主）卡齊米日三世（Kazimierz III Wielki, 1333-70）的統治之期，仍繼續招募包括猶太人在

內的大批德意志移民入境開發屯墾，促使波蘭整體國力持續上揚（Rogall, 1996: 78-79），旋即累積對外擴張的大量資本。終卡齊米日大王統治之世，雖在西部的收復故土戰役未能有成，然而他旋將目光轉向東方，趁蒙古金帳汗國勢衰之際而於 14 世紀中葉吞併了加利西亞（*Galicja, Galizia*）及波多利亞（*Podole, Podolia*）¹，從此展開了波蘭人的「東進」紀元（Conze, 1992: 79-80）。不難看出，波蘭王國自中古晚期之後，國勢已然呈現欣欣向榮之態，此由東進政策為後續波蘭各王朝所遵奉並延續，可窺見端倪。

參、14 世紀末至 16 世紀後期間從波蘭-立陶宛聯盟到波蘭王政共和國及其黃金時代的建立

1370 年皮雅斯特王朝末代君主卡齊米日大王薨，因無男性子嗣，使得歷時超過 4 個世紀之久的皮雅斯特王朝正式告終。其後經過短暫的匈牙利「安茹王朝」（*Andegawenowie, Anjou Dynasty, 1370-86*）統治之後，至 14 世紀末期時，因雄據北方波羅的海地區普魯士的德意志騎士團國家，百餘年來持續不斷入侵波蘭王國及時尚屬異教徒領域的立陶宛大公國，為了消弭此一外患的長久威脅，立陶宛決意在皈依西方羅馬天主教的前題下，與波蘭進行策略性的聯手。波蘭王室在得到立陶宛人願以皈依為條件下的締盟之議，慨然應允之，遂有波蘭王國與立陶宛大公國的聯姻締盟之舉。

一、波蘭—立陶宛聯盟的建立及德意志騎士團國家的臣服

1385 年，波蘭與立陶宛正式締結盟約『克雷沃聯盟』（*Unia w Krewie, Union of Krewo*），依該聯盟協議，立陶宛大公雅捷佛與波蘭公主雅德維佳（*Jadwiga Andegaweńska, 1373-99*）進行聯姻，於此同時立陶宛大公國亦在雅捷佛的率領下，正式皈依基督教：西方羅馬天主教會，代表全歐最後一個異教徒多神教國度的結束。雅捷佛作為波蘭國王則稱為瓦迪斯瓦夫

¹ 兩地在今烏克蘭西部。

二世·雅捷佛（Władysław II Jagiełło, 1385-1434），此一新的王朝則依其名而喚為「雅捷佛王朝」（*Jagiellonowie*, Jagiellonian Dynasty, 1386-1572），波立兩國藉由締盟合兵之勢，終有足夠實力對抗德意志騎士團國家百餘年對兩國的互久威脅。

其後未久，波-立聯盟旋即趁著德意志騎士團國家深陷內部矛盾難解²的千載難逢之機，於 1410 年的古恩瓦爾德/坦能貝格戰役（*Bitwa pod Grunwaldem*, Battle of Grunwald/Tannenberg）中，重創德意志騎士團大軍，迫其在翌年（1411）簽署『第一次托倫和約』（*pokój toruński*, *First Peace of Thorn*），償付鉅額賠款。波-立聯盟的軍事大捷，進一步惡化了騎士團國家內政危機，終令騎士團國家內部數十年後爆發了內戰，史稱十三年戰爭（*Wojna trzynastoletnia*, Thirteen Years War, 1454-66）。其間透過波-立聯盟許諾騎士團國家內部反對勢力：各城市市民階級及土地貴族大量特權的條件下，從而襄助其共同打擊騎士團國家統治階級，最後迫令騎士團大團長元氣盡喪，毫無再戰之力，終在 1466 年的『第二次托倫和約』（*Drugi pokój toruński*, *Second Peace of Thorn*）中，被迫向波蘭—立陶宛聯盟割土稱臣（Haffner, 1979: 15）。騎士團國家立國核心所在的普魯士旋遭到分割，維斯瓦河以西的西普魯士（*Prusy Polskie*, Western Prussia），以及維斯瓦河以東的埃爾姆蘭（*Warmia*, Ermland）與庫爾姆蘭（*Ziemia chełmińska*, Chełmno Land）直接併入波蘭王國疆域之中，稱之為「波蘭王家普魯士」（*Prusy Królewskie*, Polish Royal Prussia），至於殘餘的東普魯士（*Prusy*

² 從 14 世紀中期之後，德意志騎士團國家核心所在的普魯士境內，興起了兩股新興勢力，即兩大「等級」（*Stand*）：土地貴族（日後的容克階級，*Junker*）及城市市民階級（*Bürgertum*），隨其實力漸增，因而出現要求參與騎士團國家內部各項決策的訴求，以維繫自身的政經利益。然而其訴求卻遭到以騎士團大團長為首的統治階級所悍然擱拒，遂引發兩大等級的高度不滿。為了恒久排除兩大等級分享國家大權的可能性，騎士團國家統治階級甚至釋放大量地產，引誘原為土地貴族耕種的農民轉耕，使土地貴族農地上出現人力吃緊的態勢；與之同時，騎士團統治階級亦大力介入波羅的海貿易活動，透過與當時掌控波羅的海與北海的商貿霸主—德意志漢薩組織（*Deutsche Hanse*, German Hanse）建立密切合作關係，嚴重侵蝕境內各大城市諸如但澤（*Gdańsk*, Danzig）、埃爾濱（*Elbląg*, Elbing）、布勞恩斯貝格（*Braniewo*, Braunsberg）、庫爾姆（*Chełmno*, Kulm）及托倫（*Toruń*, Thorn）等各城市市民階級的大量商業利潤。凡此種種，皆使騎士團國家的兩大等級對騎士團統治階級的不滿之心急遽升高。

Zakonn, Eastern Prussia) 雖仍保留予騎士團大團長持續領有，然必須尊奉波蘭國王為最高宗主而成為其藩屬，是為「普魯士瓜分」(Rogall, 1996: 92-93)。

擊潰了北方長期外患之後，波蘭-立陶宛聯盟不僅取得通往波羅的海的出海口，而且透過大量原騎士團國家西普魯士的各大要城商港的歸附，使得波羅的海興旺的商業網絡帶來的商業利基可進一步延伸至全國，這對日後一個世紀的波蘭-立陶宛聯盟國家財政收支，貢獻頗大，為爾後波蘭黃金時代的塑造，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二、波-立聯盟的再強化及波蘭-立陶宛王政共和國的建立

然則北方強敵甫一消弭，波蘭-立陶宛聯盟的新一波外患威脅，逐漸由國境東部及東南部迫近而來，此係東部新興的莫斯科公國及東南方的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崛興使然。從 15 世紀中後期擺脫了蒙古金帳汗國的威脅後，莫斯科公國逐步晉升成為歐亞草原上的新興強權，擴張矛頭逐漸朝西指向立陶宛大公國，遂與立陶宛之間爆發了數次的軍事衝突。惜因受制於波蘭-立陶宛聯盟在初始之際，尚屬鬆散聯盟而兩國間並未明訂彼此軍事支援義務的前題下，立陶宛因而在對抗莫斯科時漸漸落居下風，導致大批立陶宛大公國東疆及東北疆國土為之淪喪 (Halecki, 1963: 88)。

與此同時，已成黑海及巴爾幹半島霸主的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在征服巴爾幹半島全域之後，亦逐步橫越多瑙河而逐步朝向波-立聯盟的東南半壁而擴張，波蘭王國雖在 15 世紀後期的一連串邊境戰事中，成功抵禦土耳其人及其附庸克里米亞韃靼人的犯邊行動。然而由於波蘭王國東南疆與立陶宛大公國東疆某些領域相毗鄰，為了達成更有效率的邊境攻防任務，波蘭頗思取得其時尚屬立陶宛東疆的若干領地，以利軍事布局。與之同時，波蘭各貴族亦思大舉東進至立陶宛大公國東疆，取得大批領土來建立其大莊園，進而大幅擴張自身貴族世家的威望及影響力。尤有甚者，在立陶宛人亟需得到波蘭援助以對抗莫斯科擴張的背景下，兩國內部逐漸出現締結更緊密同盟的呼聲。

於是波立兩國在高層及貴族的共識下，雙方先後透過了 1413 年的『霍洛德佛聯盟』（*Unia horodelska, Union of Horodlo*），以及 1505 年在拉東（Radom）所召開的國會（*Sejm Radomski 1505*）中頒佈的『無新法』（*Nihil novi*）³中，將立陶宛貴族大舉提升至與波蘭貴族相同的地位與權利，並在憲法中明文保障了貴族的各項特權，並使王權受到相當大程度的箝制。亦透過此一安排，逐步使立陶宛大公國增強進一步融入由波蘭王國所主導的國度意願，遂有數十年之後的「盧布林聯盟」的簽署，將波蘭王國及立陶宛大公國幾乎全面的合併為單一國度。

歷經長期的磋商之後，1569 年 7 月 1 日，波蘭王國與立陶宛大公國雙方終於正式簽署更緊密的聯盟條約『盧布林聯盟』（*Unia lubelska, Union of Lublin*），結成為「一個不可分割的軀體」，正式國名「波蘭-立陶宛王政共和國」（*Rzeczpospolita Obojga Narodów, Royal Republic of Poland-Lithuania*），此即為波蘭歷史上的「第一共和國」時期。這個王政共和國擁有幾項特點，首先國王雖名為國家最高領導者，但實權實掌控在「國會」（*Sejm*）之手，國會擁有立法權，且國會貴族議員皆享有「自由否決權」（*liberum veto, free veto*），意即法案必須要得到全體貴族議員的一致同意始能通過。此外並將立陶宛國會合併至波蘭國會，同時規定未來共和國的國王須透過國會選舉產生，兩國貴族必須在波蘭首都克拉科夫選王並進行加冕，此外雙方執行共同的對外政策，並擁有共同的貨幣體系，最後立陶宛並將其東疆的波德拉齊亞（*Podlasie, Podlachia*）、沃林尼亞（*Wołyń, Volhynia*）及基輔（*Kijów, Kyiv*）等 3 省，轉讓予波蘭（*Rhode, 1980: 217*）。

盧布林聯盟簽署之後，儘管名義上，立陶宛仍保有少許內政自治權限，實則從上層階級及貴族以降，立陶宛全國幾乎全方位壟罩在波蘭政、教、經、社、文的影響之下，因而自此之後，除了最底層的農民階級外，立陶宛就逐步步向了一段「波蘭化」的紀元，終至全然失去了自身主體性，因

³ 此係波蘭國會在 1505 年時所立法通過的法案，意謂「若無公眾同意就無新事務」，也就是新法案若沒有在國會中為貴族議員所一致同意，就不可能通過。該法大大限制了波蘭國王的立法權限，並開啓了所謂貴族民主制之始，即日後的貴族黃金自由。

此一國度雖名為波蘭-立陶宛王政共和國，實則實質上的主導者為波蘭所有，立陶宛的角色在後續年代中逐步遭到虛化，乃至於淪落至無足輕重的地位，終隨著波蘭國勢自 16-18 世紀的起落而與之共榮共亡。此由整個 17-18 世紀的近兩百年左右，歐洲各國普遍以「波蘭王政共和國」來稱呼此一國度的情形，不難窺見波蘭才是真正主導者。

三、雅捷佛王朝的盛世及波蘭黃金時代的建構

透過數次聯盟而逐步將立陶宛大公國整併至「王政共和國」的歷程中，不難見證出波蘭國勢步向興盛的發展，致而使立陶宛心生藉波蘭之力而共抗外敵之思。事實上整個 16 世紀之期，波蘭已達到巔峰盛世，是為波蘭的「黃金時代」(*Złoty Wiek Polski*, Polish Golden Age)，尤其在雅捷佛王朝的最後兩位君主：「長者」齊格蒙一世 (Sigismund I the Old, 1506-48) 及其子齊格蒙二世·奧古斯特 (Sigismund II Augustus, 1548-72) 統治期間，全然體現了這段波蘭史上的璀璨紀元。此一時期，不僅在政治軍事上力壓週遭群雄而獨霸於中東歐至東歐大陸，在經社文方面亦臻至光輝燦爛之境，成為歐陸東半部樂土。

16 世紀正是歐洲「文藝復興」(Renaissance) 後期至「宗教改革」(Reformation) 運動之期，處於其間的波蘭，亦受兩大浪潮的波及而使其全境呈現繽紛絢爛之姿。由於波蘭政經社在 15 世紀末至 17 世紀前期的穩定發展，使得波蘭首都克拉科夫的貴族及波羅海地區的城市富商階級，為了展現其不凡身家，競相引入了其時盛行的文藝復興式的藝文風格，其後齊格蒙一世與米蘭大公之女波娜·斯佛薩 (Bona Sforza, 1518-48) 在 1517 年的締婚，則為波蘭全境進入文藝復興風扮演了關鍵推手。首先在王后的推動下，王城所在的克拉科夫王宮在義大利建築師經手後被改建為文藝復興式風格，加之在此一時期大批波蘭學子前往義北各大城邦學習文藝復興的各型風格技藝，歸國後則投入知識界各領域的發展，使得克拉科夫成為人文薈萃之所，王宮、貴族宮廷、學校及富商宅第紛紛出現藏書豐富的圖書館，從而造就出克拉科夫大學成為阿爾卑斯山以北的思想重鎮的地位，

第一部以波蘭文寫成的文學作品即出現於此際，這為日後波蘭民族文學的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Halecki, 1963: 99-100）。此外尚值得一提的是，出身於波蘭王家普魯士（西普魯士）的德裔波籍學者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 1473-1543），亦是此一期間任教於克拉科夫大學，其後他在 1543 年所發表的《天體運行論》（*De revol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內容確認了古希臘學者阿里斯塔克斯（Aristarkhos, 310-230 B.C.）的「太陽為宇宙中心」（*Heliocentryzm/Heliocentrism*）的觀點，正是呈現著文藝復興風潮在波蘭所產生的重大影響之一。

此外，宗教改革風潮亦在稍後年代中波及至波蘭全域，係因隨著 1517 年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在德境的維騰貝格（Wittenberg）登高一呼，掀起了宗教改革運動之後，未幾旋在歐陸各地造成信仰分裂及新舊教衝突之局，隨著其後宗教戰爭的爆發，許多在中歐及德意志南部各地受到宗教迫害的新教徒，此際紛紛湧入波蘭。儘管波蘭王室官方的宗教信仰為舊教（天主教），然而齊格蒙一世秉持宗教寬容的原則，堅拒對新教徒及其他包括猶太教在內的不同宗教派系採行打壓行徑，使得此一時期的波蘭遂成新教各派系及猶太教徒躲避宗教迫害的天堂，若再加上王政共和國的東疆，即原立陶宛大公國境內的大批東正教徒，此一時期的波蘭成為各種宗教信仰者薈集於一堂的國度，這在宗教改革時期的絕不見容於相異教義的時代中，可謂異類（Halecki, 1963: 105-106）。儘管至 16 世紀中葉齊格蒙二世上台以後，舊教（天主教）在革新運動有成且建立了戒律森嚴的耶穌會組織之後，在波蘭境內展開了反宗教改革（*Kontrreformacja, Counter-Reformation*）行動，透過國王意願及內部制度安排等有形無形的箝制之下，迫使許多先前皈依新教的波蘭貴族，再度回歸舊教的陣營，但過程中並未使用殘酷的迫害手段來對付宗教異議人士（Augustynowicz, 2010: 49）。此種對不同宗教信仰的包容，亦是成就 16 世紀波蘭黃金時代的關鍵要因之一。

四、雅捷佛王朝的結束及巴托利的中東歐暨東歐霸權地位的建立

1572年，齊格蒙二世過世，因無男嗣，雅捷佛王朝遂告終結，依照先前『盧布林聯盟』的相關規定，王政共和國開始進行首度選王的程序。此際波蘭及立陶宛全境各地大小貴族作為國會議員的身份，擁有選舉國王的權利，已初步可看出對後世波蘭王政共和國中央王權的衰凌，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其因有二：首先各方人選在競逐過程中，為遂其心願，必然在事前大舉賄賂及事後賦予特權來攏絡貴族議員，使得王權更加虛弱。尤為嚴重者則是一旦有強大外患的出現，波蘭王位很有可能透過外力重金賄賂貴族議員的方式，落入外力所屬意的人選而使之淪為傀儡。在16世紀波蘭尚無嚴重外患之時，所面臨到的是為第一種情形，1573年源自法蘭西瓦洛瓦王朝的亨利（Henry III of Poland, 1573-75），即透過豐厚的賄金收買了足夠的貴族議員票數後，成功地被選為波蘭國王。為了酬謝大批國會貴族議員的支持，遂簽署『亨利條款』（*Articuli Henriciani*），給予貴族大量特權（Rhode, 1980: 248）。然瓦洛瓦的亨利在位不及一載，1574年隨著其王兄法王查理九世的遽逝，旋即拋棄波王之位而秘返回法國登基，是為瓦洛瓦王朝最後一任君主亨利三世（Henry III of France, 1574-89）。稍後經過兩年的無王紛爭之局後，被選為新任波王的外西凡尼亞大公巴托利（Stefan Batory, 1576-86），亦是透過攏絡貴族議員的模式而簽署『協議條款』（*Pacta Conventa*）。由『亨利條款』及『協議條款』的相關規定，可說將本已享有極大特權的貴族議員，再次為其大幅增擴各項特權，與此同時殘餘的王權則幾乎被削弱殆盡。兩協議重要內容大致如下：

1. 國王必須定期召開國會，並確保自由選王制的持續運作。
2. 法案提案及通過之權皆在國會。
3. 徵稅及王室專營事業需經國會同意始可為之。
4. 締約宣戰需經國會同意才能進行。
5. 國王締婚亦須先知會國會並得到許可後始能進行。
6. 國王不得有王家印璽，只能有以國家為名的印璽。
7. 國王必須維持全國境內各宗教派系的和平之局，避免衝突出現。

8. 國王若違反上述條款，則國會貴族議員有反對抵抗之權。

兩協議的正式通行適用，無異於宣告王政共和國的國王之名基本上僅剩象徵意涵，國政大權實質上盡行掌控在佔全國人口總數不到 10% 的各地貴族手中，亦因實權盡掌握於貴族之手，因此日後外界遂以「貴族黃金自由」的用語，來凸顯貴族在王政共和國所享有的重要地位，甚至以「貴族共和國」（*Rzeczpospolita szlachecka, Republic of Nobles*）來形容此一共和國所具有的實質內涵（Rhode, 1980: 248-50）。

面對王權在各方面幾乎橫遭瓦解的情形，波蘭國政的運作及國勢的維繫只能仰賴被選為國王者，擁有卓越長才並設法建立高度威望，更重要者是必須能與國會中貴族議員的意見領袖建立良好關係，方能約束驕縱貴族而使其通過國王心繫的法案，而 1576 年被選為波王的巴托利即是此類傑出君主之一。巴托利登基之後，決心以王室所擁有的僅存籌碼，並透過與國會貴族意見領袖楊·薩摩伊斯基（Jan Zamoyski, 1542-1605）的密切合作，試圖對外建立其功名。於是他大力在王畿領地上推動一項軍隊改革，採用當世最新軍武裝備而成功建立起一支專屬王室的精銳之師，隨即將之投入對抗沙俄的戰役之中。前曾提及，從 15 世紀末期至 16 世紀初以來，莫斯科公國及由其轉變而來的沙俄帝國，逐步向西擴張，立陶宛即在漸感不支的狀態下而決定與波蘭締結為單一國度，因此波蘭隨之接手而成為抗俄主力。至 15 世紀中葉，沙俄皇帝伊凡四世（Ivan the Terrible, 1533-84）在位時，開始展開一連串西征行動、企圖攻佔德意志騎士團分支立夫尼亞騎士團在東北歐的最後領地立夫尼亞（*Inflanty, Livonia*），⁴俾取得波羅的海的出海口，此舉引發週遭列強聯手干預，遂引爆了立夫尼亞戰爭（*Wojny Inflanckie, Livonian War, 1558-82*）。波蘭王政共和國在巴托利的領軍之下數度大破沙俄大軍，波軍深入俄境各地，最後迫使伊凡四世在 1582 年簽署『楊·薩波爾斯基和約』（*Rozejm w Jamie Zapolskim, Peace of Jam Zapolskij*），放棄繼續向西擴張的野心（Seward, 1972: 131）。

⁴ 立夫尼亞或立夫蘭，為歐洲中古時期對東波羅的海地區的稱謂，其地即今日的拉脫維亞及愛沙尼亞之地。

巴托利透過軍事上的大捷，不僅將波蘭王政共和國的版圖向外擴張至立夫尼亞及俄境西部，收復過去立陶宛的大片失地，成就其疆域遼闊的中東歐暨東歐大陸的獨霸地位，同時亦藉由其對外所立下的卓越戰功，得以抑制國內桀敖不馴的各地貴族，成功地再次樹立起王室威信，亦使波蘭盛世紀元得以延續至 16 世紀後期而不輟。

肆、17 世紀王政共和國體制運作的惡化及波蘭的盛世餘暉

巴托利逝世之後，各大貴族透過自由選王制而選舉出瑞典王國瓦薩家族中人為王，開啓了波蘭的「瓦薩王朝」（*Wazowie, Vasa Dynasty, 1587-1668*）之始。在瓦薩王朝 90 年的統治期間，表象上波蘭仍持續呈現著歐陸東半部霸主之態，實則內部已然浮現諸多問題，卻因君主的偏執及波蘭國會的私心自用，終使內部問題未能及時獲得改善，長此以往，終而導致王政共和國弊端叢生。其後雖有波蘭盛世最後一位君主楊三世·索別斯基的重振國威，然卻只能延緩，終難力阻華廈於傾塌。

一、以天主教為尊的齊格蒙三世

1587 年波蘭國會正式選出瓦薩家族的齊格蒙三世（*Sigismund III Vasa, 1587-1632*）為王，新王源出瑞典，成長於基督新教路德宗的環境，然而齊格蒙三世因競選波王之故而改皈天主教，未料在其任內，出自對天主教的虔誠而所採行的各項作為，無形之中對波蘭王政共和國全境的內聚力造成難以挽回的傷害，終使波蘭國勢從 16 世紀末開始橫受極大衝擊。齊格蒙三世自從皈依天主教並當選波王之後，宗教立場上愈來愈獨尊天主教而無視於王政共和國原有的宗教寬容原則，他重用大批的天主教耶穌會神職人員，出任國政顧問及掌控國家教會機構等要職，執行各類強化天主教政策，期能達到萬宗皆終歸於天主教一宗的境界。這不僅使得王政共和國境內的眾多其他教派信徒，諸如基督新教各派及東正教教徒為之惴惴不安，亦使

其在與週遭其他非天主教為國教的國度互動中，爆發許多軍事衝突。在齊格蒙三世任內，先後爆發了波蘭-瑞典戰爭、波蘭-俄羅斯戰爭、及波蘭-土耳其戰爭，這 3 場戰爭表面上或有諸多錯綜成因於其間，實則宗教因素在 3 場戰爭中，皆扮演了核心的關鍵。

首先就天主教於王政共和國內部取得絕對優勢的發展來看，從 1592 年開始，齊格蒙三世公然違背了過去長期以來波蘭歷朝所採行的宗教寬容立場，縱容耶穌會士在境內進行強力的反宗教改革行動，對基督新教各派系的教會機構及學校展開暴力的破壞及強迫改宗的行動，在王政共和國首席宮廷教士暨波蘭耶穌會會長史卡嘎（Piotr Skarga, 1536-1612）的主導下，基督新教各派系的信眾，即令貴族亦然，皆橫遭無情打壓，處境日益惡化，在國王蓄意漠視下，最後新教徒若非選擇改皈舊教，否則就只能逃離王政共和國，少數居留者僅能惶惶度日，波蘭境內的基督新教勢力為之大衰。

於此同時，王政共和國東疆人數眾多的東正教徒，亦遭官方耶穌會勢力愈趨強化的歧視及改宗的壓力，這當然亦與 16 世紀末沙俄的東正教會發展息息相關，係因在 1589 年，沙俄首都莫斯科的東正教會在君士坦丁堡希臘東正教牧首的允准下突然宣佈，莫斯科東正教會牧首係「莫斯科及全羅斯人」東正教信徒的教會領袖及精神信仰中心，此舉令波蘭王政共和國官方及耶穌會大為緊張，深恐其對境內東正教徒產生向心力，遂決心強化對王政共和國東部的東正教臣民與王室及官方天主教的緊密聯結。於是經過一系列折衝妥協之後，遂有 1596 年的『布列斯特聯合』（*Unia Brezka, Union of Brest*）協議的簽署，致而產生了在保留東正教教儀及使用教會斯拉夫語的前題下，尊奉羅馬教宗為最高宗教領袖的「魯特尼亞聯合教會」（*Ruski Kościół Unicki, Ruthenian Uniate Church*），或稱「東儀天主教會」（*Katolickie Kościoły wschodnie, Eastern Catholic Church*）。這很明顯地是王政共和國境內的若干東正教教會人士，面對王政共和國中央宗教政策的愈趨嚴峻之下，不得不做的妥協之舉（Halecki, 1967: 117-18）。然則聯合教會或東儀天主教會的創立，不僅遭受到來自包括君士坦丁堡及莫斯科等東正教教會的強烈批判，亦不為波蘭耶穌會所接受，使得王政共和國官方

與其東儀天主教及東正教臣民間的緊張關係難以緩解，也種下了日後沙俄對王政共和國東部的東正教信徒介入操弄的因子。

二、齊格蒙三世對外政策上的失策

在對外政策方面，同樣亦可看出齊格蒙三世以天主教為尊所帶來的不利影響，首先就是波蘭與瑞典的關係。在齊格蒙三世當選波王甫滿五年後，其父瑞典國王約翰三世（John III of Sweden, 1568-92）駕崩，於是齊格蒙三世得以兼領瑞典國王，成為波瑞兩國的共同君主（1592-98）。然而齊格蒙三世不僅欲將原屬瑞典所有的愛沙尼亞併入波蘭的立夫尼亞之中，甚至頗有意將瑞典重新帶回舊教陣營，建構起波蘭-立陶宛-瑞典王政共和國。引發瑞典部分新教貴族強烈不滿，遂支持其叔父查理為首而罷黜齊格蒙三世的瑞典王位，致而引發後續一系列波蘭-瑞典戰爭（Polish-Swedish War, 1600-29）

於此同時，波蘭王政共和國亦趁此際沙俄深陷「混亂時代」而大舉介入沙俄政局，齊格蒙三世頗欲利用俄境中央無主的亂局，趁機擴大王政共和國版圖，甚至進一步吞併沙俄全境，強令東正教教徒全面皈依天主教，完成基督教的大一統大業。1610年，齊格蒙三世大軍攻陷莫斯科，然而齊格蒙三世的領土及宗教野心激起俄人強烈不滿，終而不斷起事反抗波蘭統治，最後迫使波軍撤出莫斯科。沙俄新王朝「羅曼諾夫王朝」隨之在1613年建立，繼續與波抗爭，直至齊格蒙三世過世之後，波俄終於在1635年簽約休戰，暫時終止了雙方長期的衝突。

王政共和國原與南方鄂圖曼土耳其帝國之間保持了數十年之久的寧靖之局，亦在17世紀前期遭到破壞，其因在於王政共和國南方立場激進的波蘭貴族從1612年開始，不斷干涉土耳其屬國摩爾多瓦公國的事務，甚至唆使聶伯河邊疆地帶的同盟軍隊哥薩克騎兵，不斷洗劫黑海沿岸的土耳其屬國克里米亞韃靼汗國，導致雙方關係急速惡化。最關鍵者在於1618年三十年戰爭（Thirty Years' War）爆發後，齊格蒙三世基於其虔誠的天主教信仰，而大力支持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兼奧地利大公的哈布斯堡王朝腓

迪南二世（Ferdinand II, 1619-37），甚至派軍參與攻擊外西凡尼亞的新教徒，然而斯時外西凡尼亞係屬土耳其人的勢力範圍，遂引爆波蘭與土耳其的軍事衝突。

波土戰爭雖僅歷時 3 年，然而被捲入歐陸三十年戰爭泥淖中的波蘭卻無脫身之機，係因瑞典新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Gustavus Adolphus, 1611-32），對心繫天主教的齊格蒙三世始終不願放棄瑞典王位而心存忌憚之外，且基於德境新教徒在哈布斯堡王朝天主教大軍的攻勢下，節節失利，因而決心介入三十年戰爭，襄助新教徒陣營。於是瑞軍迅速南下，連下德意志及波蘭中北部各要城，齊格蒙三世為了扭轉不利戰局，不得不向統治勃蘭登堡邊區伯國（Markgrafschaft Brandenburg）的霍恩索倫家族（Haus Hohenzollern）讓步，藉由同意其兼領普魯士公國（東普魯士）的公爵之位，接手先前同屬霍恩索倫家族另一分支但剛斷嗣的統治權，藉此避免同屬新教陣營的勃蘭登堡邊區伯國加入瑞典王國而與波蘭為敵。儘管此際波蘭仍保有對普魯士公國（東普魯士）的宗主權，然而透過霍恩索倫家族同時掌控勃蘭登堡邊區及普魯士公國（東普魯士），無意間在波蘭北部打造另一股新興的德意志勢力勃蘭登堡-普魯士（*Brandenburgia-Prusy, Brandenburg-Prussia*），這個在日後數十年間轉變成普魯士王國的國家，未料對日後波蘭王政共和國的發展卻造成意想不到的威脅與衝擊。

三、瓦薩王朝的餘暉及大洪水時代的衝擊

1632 年齊格蒙三世駕崩，其子瓦迪斯瓦夫四世（Władysław IV Vasa, 1632-48）被選為波王，瓦迪斯瓦夫四世試圖修正其父在宗教立場上的強硬態度所造成的王政共和國內外困局，首先他重回宗教寬容的立場並約束激進約蘇會士對宗教異議者的打壓，使境內各宗教敵對態勢獲得一定程度的緩和。其次對取得瑞典王位的立場上，亦不採積極態度，雖未言明正式放棄之，但對其叔父瑞典國王古斯塔夫·阿道夫則採謙遜恭敬之態，從而大幅緩和波瑞兩國的緊張關係。瓦迪斯瓦夫四世隨即將重心轉向東部的沙俄，在無後顧之憂的狀態下，取得一系列的邊界戰役的勝利，將俄軍逐出

了波蘭邊界地帶，最後且迫令其與之聯手對抗鄂圖曼土耳其帝國。事實上，當王國北部及西部的情勢穩定下來之後，對瓦迪斯瓦夫四世而言，在其號召之下而籌組基督教聯盟，對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發動一次大規模的十字軍行動，是他心懷建立起瓦薩王朝不朽功名的遠大夢想。然而方當歐洲三十年戰爭幾近尾聲，各基督新舊教國家都為之精疲力竭之際，此一計劃可謂無由實現之機。即令他後來將計劃作出修正，僅聚焦於徹底消除土耳其人對王政共和國東南半壁的威脅，藉由聯手哥薩克人（*Kozacy, Cossacks*）而將土耳其勢力逐離黑海及多瑙河彼岸之外，卻也因其好大喜功，在未能取得國會的一致同意之前，即欲以國王的權威，而迫令國會通過其軍事法案的相關預算，致而導致國會貴族議員認定國王違反了各項協議條款，憤而駁回了瓦迪斯瓦夫四世的要求，此一發展，立即引發嚴重後果。

1648年瓦迪斯瓦夫四世過世後，王弟楊二世·卡齊米日（*John II Casimir Vasa, 1648-68*）繼位，王政共和國旋即陷入了一段大動蕩時代，史稱「大洪水」（*Deluge*）時代，事因王政共和國東南方的哥薩克人叛變，隨後引發連鎖效應，導致週遭國度交相入侵王政共和國有以致之，此一亂局，使得波蘭內外皆深陷危機之中。哥薩克人常期作為王政共和國的盟友，屏障共和國的東南疆，原為一股穩定邊防的軍力，然而在齊格蒙三世在位期間，官方及耶穌會的天主教勢力對王政共和國東半部的東正教徒施壓改宗，導致信奉東正教的哥薩克人離心離德，出現騷動不安之勢，直至瓦迪斯瓦夫四世上台重拾宗教寬容之策後，雙方緊張關係才獲舒緩，哥薩克人才願再次與王政共和國合作。因此當先前瓦迪斯瓦夫四世欲將土耳其及其屬國克里米亞韃靼汗國的勢力逐離黑海之濱時，即欲與哥薩克人聯手展開攻擊。殊未料瓦迪斯瓦夫四世的遠征計劃橫遭波蘭國會所否決，且在哥薩克人中保有高度威望的瓦迪斯瓦夫四世突於此際遽逝，導致波軍未能按計劃赴約聯手，此舉令哥薩克人心生不滿，認定王政共和國毀約，遂憤而叛變，是為「赫梅利尼茨基起義」（*Powstanie Chmielnickiego, Khmelnytsky Uprising*）事件。哥薩克人甚至聯手土耳其人及韃靼人轉向攻擊王政共和國，歷經數年的混亂之後，王政共和國最後在1651年成功地弭平哥薩克人的反叛。

然而哥薩克人心有不甘，遂於 1654 年決定轉向與同屬東正教信仰的沙俄帝國結盟，於是沙俄遂在哥薩克人的協助之下大舉攻入王政共和國的東疆地帶，連下王政共和國東北疆大片領地，並深入東波羅的海的立夫尼亞地區。然而此舉甚令瑞典為之不滿，係因該地為瑞典屬地。從三十年戰爭以來建立起一個環波羅的海的霸權國家的夢想，已然深植於瑞典歷朝國王心中，因而瑞典國王卡爾十世（Charles X Gustav, 1654-60）決定介入戰爭，欲先擊垮波蘭後、再壓制俄羅斯，是為第二次北方戰爭（Northern War of 1655-60），致而形成波、瑞、俄三方大混戰的波羅的海霸權之爭。戰端開啓之後，瑞軍分兵多路，迅即深入波蘭各地，先後襲陷華沙及克拉科夫，楊二世·卡齊米日奔逃至南方避難，波蘭若干重要貴族甚至轉向支持瑞典國王入主王政共和國，波蘭看似崩潰在即。幸賴此際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兼奧地利大公雷歐波德一世（Leopold I, 1658-1705），以同為忠實天主教君主立場，全力支持王政共和國，波蘭才現轉機，進而轉守為攻。此後數年幾經交鋒各方陣營互換及征戰攻伐，最後成功阻卻瑞典對波蘭的野心，波瑞雙方終在 1660 年簽署『歐立瓦和約』（*Peace of Oliva*），波蘭除了放棄對瑞典王位的要求之外，並將立夫尼亞轉讓予瑞典，另外，亦因酬謝勃蘭登堡－普魯士的大選侯腓特烈·威廉（Friedrich Wilhelm, 1640-88）在戰時的轉向支持波蘭，波王遂放棄對普魯士公國（東普魯士）的主權，自此勃蘭登堡邊區伯爵兼選侯終於正式取得普魯士公國（東普魯士）的主權，為其崛起成為波羅的海及德意志地區新興強權，奠定重要基礎。其後第二次北方戰爭終止於波俄在 1667 年所簽署的『安德魯索沃和約』（*Rozejm w Andruszowie, Truce of Andrusovo*），王政共和國失去了第聶伯河（Dnieper）以東的大片領地，基輔亦為沙俄所奪，王政共和國的東疆自此愈受快速興起的沙俄帝國迫人而來的威脅。

四、琴斯托侯瓦之黑色聖母奇蹟的迷思及瓦薩王朝的結束

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二次北方戰爭期間所發生的一段所謂「奇蹟」事件，亦對波蘭王政共和國後續發展造成極為深遠的影響，無論就對王政共

和國國勢的衝擊及波蘭全民天主教信仰的高度虔誠化皆然，此即 1655 年琴斯托侯瓦修道院 (Częstochowa) 的「黑色聖母」(*Czarna Madonna, Black Madonna*) 奇蹟事件。在戰端初始之際，當瑞軍攻勢勢若排山倒海地席捲了王政共和國全境各地，並進而包圍波蘭南部的琴斯托侯瓦修道院時，此際修道院長高舉「黑色聖母」像，號召並鼓舞當地義勇軍為保家衛國而奮起力抗強敵，最後歷經四晝夜的激戰之後，竟成功地擊潰瑞軍而解圍。琴斯托侯瓦之役對整體戰局的走向其實並無實質影響，然而在時人的不斷傳播及口耳相傳的歌頌之下，波蘭人愈發深信是因黑色聖母庇佑其所忠愛的波蘭子民，方能將波蘭從崩潰敗亡的煉獄中拯救出來，於是琴斯托侯瓦之「黑色聖母」顯靈的奇蹟，自此就成為了波蘭全民堅信不疑的傳奇，這對波蘭全境天主教信仰的凝固化，扮演了十足關鍵性的影響。然而另一方面這當然也代表了已呈岌岌可危的波蘭宗教寬容政策，愈發難以維繫，其後果將在下一個世紀中顯現出來。

隨著 1667 年第二次北方戰爭的結束，翌年，楊二世·卡齊米日旋即過世，瓦薩王朝正式告終。王政共和國在歷經了重大危機的衝擊下，雖仍勉強能保住歐陸東半部大國之態，然自此亦不難看出，波蘭已處於危機四伏的環境之中，改革之舉迫在眉睫。事實上，在第二次北方戰爭期間，波蘭政壇上即出現應進行國會必要改革的呼聲，針對貴族議員所擁有的大量特權做適度的限縮，尤其是「自由否決權」(一票否決全部的設計) 應予廢除，轉而將之修正為只要得到絕對多數票數，法案即通過即可。惟此際仍有部分波蘭貴族議員囿於自身利益，誓死抵抗，甚至採取武力抗爭的方式，終使改革措施最後功虧一簣 (Rhode, 1980: 284-85)。然而改革契機轉瞬即逝，隨著 17 世紀末期開始，波蘭國會貴族權力受到外力介入狀況的愈見增多，以及濫用自由否決權情形的頻繁出現，終使王政共和國的根基不斷受到侵蝕，逐步向藥石罔效之境。

五、王政共和國在楊三世·索別斯基力挽狂瀾下的落日餘暉

在 1669 年的貴族選王大會之時，或許王政共和國各大貴族仍處於國家幾乎山河不保的震驚之中，因而摒拒所有外國人選，選出一位波蘭貴族為王，不過新王並無治國長才，最後在土耳其人的入侵中戰歿。最後成功在這場艱辛對抗土耳其人的戰爭獲勝、並穩固了王政共和國東南半壁者，係一位戰功彪炳的王國蓋特曼（Hetman）⁵，出身自波蘭貴族世家的楊·索別斯基。於是在其赫赫名聲的影響下，成功地在 1674 年的選王會議中以全票通過之姿而登上波蘭國王之位，此即楊三世·索別斯基（John III Sobieski, 1674-96）。

楊三世·索別斯基可謂是波蘭王政共和國步向日暮黃昏之途前的最後一位英主，在他勵精圖治之下，波蘭國勢一度振衰起弊，重現中興氣象。既為中興令主，他亟欲將波蘭再次打造成為從波羅的海到黑海的歐陸東半部的霸權地位，因此透過其后出身自法蘭西「波旁王朝」(Bourbon Dynasty) 的姻親關係，希望與法王路易十四 (Louis XIV, 1643-1715) 締結緊密同盟，俾助其收復過去失土。不過路易十四以打垮哈布斯堡王朝而建立起其歐陸獨霸地位為首要政治目標，因而不惜拉攏鄂圖曼土耳其帝國，藉由兩方合作而由西東兩方同時夾擊哈布斯堡王朝。然而此種政策全然無法為楊三世·索別斯基所接受，係因他向來自視王政共和國是捍衛歐洲基督教的堡壘，一個佇立於歐陸東部對抗異教伊斯蘭教及異端東正教的要塞之所在。基於此種想法，因而他遂放棄與法結盟，轉而與哈布斯堡王朝締訂攻守同盟，透過波奧的密切合作，並在羅馬教宗的支持下，試圖建構起一個抗土的基督教各國聯盟。未料波奧締盟甫一完成，其所想定的威脅隨即到來，即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在內部改革有成之後，正式對歐陸發動第三波、也是最後一波大功勢，劍指中歐的鎖鑰城市—哈布斯堡首都維也納而來，企圖拿下這座「金蘋果」城市後，以之作為征服全歐洲的跳板，於是乃爆發了 1683 年的「第二次維也納圍城戰」(Second Turkish Siege of Vienna 1683)。

⁵ 蓋特曼是波蘭王國及立陶宛大公國的最高軍事總指揮，其地位相當於今日全國最高武裝總司令。

當時維也納遭圍二個月之久，全城幾近彈盡糧絕，皇帝雷歐波德一世甚至早已先行逃離圍城，避難於奧境西疆的林茲（Linz），金蘋果城市看似大勢已去。值此近乎絕望之際，幸賴楊三世·索別斯基親率大軍千里馳援，方盡解維也納之圍。是役中，楊三世·索別斯基先行登頂緊依維也納之旁、山勢險要的禿頭山（Kahlenberg），遂據有利地勢。隨即居高臨下，先以密集火砲重擊土軍陣地，待其陣勢大亂之後，波軍精銳「翼騎兵」（*Husaria, Polish Hussars*）從上而下直搗鄂圖曼統帥大營，終而大破土軍，遂盡解維也納之圍。

贏得這場在後世被歸列為影響世界歷史的一百場關鍵戰役之一：第二次維也納圍城戰的勝利，對楊三世·索別斯基及波蘭王政共和國在全歐的聲威，帶來極為熱烈的正評，紛紛賦予這位波蘭英主為「歐洲解放者」（*Befreier Europas, Savior of Europe*），以及「土耳其剋星」（*Bezwinger der Türken, Conqueror of the Turks*）等美名，大力表彰其對歐洲基督教文明的拯救功績。一時之間，波蘭王政共和國再次重現昔日全盛時期的態勢，國威聲勢達到巔峰之境。然而從此刻起一直到楊三世·索別斯基過世的十四年間所得到全歐各界的盛譽，卻也是王政共和國最後的盛世餘暉。

伍、波蘭負面觀的出現及波蘭王政共和國的瓦解

儘管 17 世紀末期王政共和國在楊三世·索別斯基的掌政下，重現中興盛世之景，然而他對內部權勢喧囂的國會貴族議員，卻始終無法弱化之，終其任內只能仰賴其不世功名而令貴族作為不致公然挑戰其地位，再加上他晚年病痛纏身，無奈只能坐視貴族議員繼續擅權跋扈，最明顯之例即是，他甚至無力去影響貴族議員們選舉其子作為國王繼承人，於是當楊三世·索別斯基甫一過世，波蘭王政共和國隨即步入風雨飄搖險境，並終至於土崩瓦解（Halecki, 1963: 144），從 1696 年楊三世·索別斯基的駕崩，一直至 1795 年王政共和國的橫遭第三次瓜分而亡國為止，歷時凡 100 年整。

一、大北方戰爭期間外力影響下波蘭國會的癱瘓

1697 年，波蘭國會貴族議員選出來自德意志境內薩克森公國公爵兼選侯「強壯」奧古斯特一世（Augustus II the Strong, 1694-1733）為新王，是為波王奧古斯特二世（Augustus II the Strong, 1697-1706, 1709-33），開啓了歷時 67 年的波蘭「薩克森王朝」（*Unia polsko-saska, Poland-Saxony, 1697-1706, 1709-63*）時期。事實上奧古斯特二世的雀屏中選實為沙俄在背後運作使然，透過奧古斯特二世及俄皇彼德一世對若干貴族議員的重金收買兼恐嚇，遂使奧古斯特二世順利登基，從中亦不難看出，外力介入波蘭選王的情形已然非常明顯，然而若干波蘭貴族的囿於自身利益，甘受外人金錢賄賂，致使王政共和國自此淪入萬劫不復的境地。

在波蘭王政共和國陷入貴族擅權而導致國政一再空轉的此際，整個外在國際局勢卻已發生鉅大轉變。進入 18 世紀以後，環繞在波蘭王政共和國四週的普、奧、俄三國皆已先後建立起所謂「絕對君主專制」（*absolutism*）的政體，此種盛行於其時的政治體制透過大有為的君主，建構起一套卓有效率性的行政官僚體系，使得全國稅收得以源源不絕地進入王室中央，從而建立起一支強大的中央常備軍，與此同時，各地割據一方的殘餘封建勢力則遭到大幅削弱甚或消滅，使得君主得以集全國之力全力向外稱雄擴張。於是在對比之下，衰頹已極的王政共和國完全無法與三雄在國際衝突場域上相抗衡。

1700 至 1721 年間涉及於波羅的海霸權之爭的大北方戰爭（*Great Northern War*），即充分見證出王政共和國的傾頹欲墜之態，在這場沙俄皇帝彼德一世為了取得波羅的海出海口，與丹麥及薩克森聯手而對決瑞典的戰爭中，原本與波蘭並無太大關聯，卻因薩克森公爵兼選侯奧古斯特一世同時作為波蘭國王奧古斯特二世之故，使波蘭連帶被迫捲入這場戰爭之中。此際波蘭國會頓成為各方外力角逐爭鬥的場域，外國賄賂大舉流入波蘭各貴族之手，藉之左右王政共和國的立場，導致一再出現不同派系的貴族議員在投票中否決出兵法案，致令在為時長達 20 年的戰爭期間，波蘭全境幾乎淪為不設防之地而成為交戰各方的馳騁劫掠之所，王政共和國國

政體制缺陷暴露無遺。當時全歐知名的時事評論《歐洲劇政》(*Theatrum Europaeum*)即已直言抨擊此一血肉俱無的空殼國度，根本難以立足於訴諸強權政治的國際環境(Zernack, 1991: 226-29)。從中已然可清楚看出，從楊三世·索別斯基過世後僅短短 20 餘年，波蘭在全歐的國際形象由正向而遽轉為負面，自此之後，「負面波蘭觀」(*Negatives Polenbild*)更隨著後續王政共和國各類弊病的爆發，廣為全歐各國所詬病攻訐。

二、托倫血腥審判對波蘭國際形象的災難性衝擊

緊隨其後的宗教迫害事件——「托倫血腥審判」(*Tumult toruński, Tumult of Toruń*)，更令波蘭王政共和國的負面形象迅速傳播並深植全歐輿論界之中。前曾提及，波蘭耶穌會從 17 世紀以來不斷進行強力的反宗教改革行動，打壓波蘭境內不同教會派系不餘遺力，後雖在瓦迪斯瓦夫四世在位期間受到些許約束，不過在第二次北方戰爭期間，受到琴斯托侯瓦黑色聖母奇蹟事件所造成全境天主教熾熱的鼓舞，使耶穌會聲勢及作為步向激進化，終而導致嚴重的宗教迫害事件，此即 1724 年的「托倫血腥審判」。

事端肇因於波蘭耶穌會會士在該年於「波蘭王家普魯士」(西普魯士)展開反新教活動，意圖強迫新教徒改宗舊教，致而在過程中引發了新舊教派之間的流血衝突，由於衝突中造成若干耶穌會會士負傷，天主教會所掌控的法庭遂採取嚴厲的報復措施，托倫市長及數名市政參事旋遭判梟首斬肢之酷刑。然而在其時歐洲各地普遍皆已進入「啓蒙運動」(*Oświecenie, Enlightenment*)時代，處在強調宗教寬容與人道主義的啓蒙運動背景中，此一蠻橫行徑旋即引爆全歐輿論的怒火，紛紛強烈批判波蘭王政共和國為一嗜血狂熱的「野蠻國度」。「托倫血腥審判」事件對波蘭在國際間的形象造成災難性打擊，全然可由日後法國啓蒙大師伏爾泰(Voltaire, 1694-1778)就波蘭瓜分事件所做的評論中看出，他認為波蘭被瓜分而亡國就是對過去「托倫血腥審判」中，一項血債血還的行動，亦是三強重新將文明帶給波蘭人的必要之舉(Wessel, 2002: 77)。此外「托倫血腥審判」亦在當時開啓週遭國度意圖瓜分波蘭的覬覦之心，普王腓特烈·威廉一世

（Friedrich Wilhelm I, 1713-40）與俄皇葉卡捷林娜一世（Yekaterina I. Alekseyevna, 1725-27）在該事件不久之後，即曾祕密締盟，約定未來若波境內新教徒及東正教徒再受迫害，則雙方將同時以武力介入，這不啻發出了未來外力肢解王政共和國的訊號。諸如上述種種，皆不難看出「托倫血腥審判」事件，對波蘭王政共和國形象所造成的災難性後果。

三、波蘭瓜分紀元中負面波蘭觀凝固化及波蘭王政共和國的覆亡

隨著波蘭王政共和國國政的全然深陷癱瘓之中，使得進入 18 世紀後半葉之後，普、奧、俄 3 國終於展開行動，逐步著手肢解波蘭王政共和國，3 強之所以此際採行行動，亦因波蘭末代國王斯坦尼斯瓦夫二世·波尼亞托夫斯基（Stanislaw August Poniatowski, 1764-95）試圖振衰起弊，大幅改革波蘭國會貴族議員擅權亂政對王政共和國所造成的傷害，然此舉反導致普俄警覺，於是唆使波蘭若干貴族製造內亂而順勢介入波蘭政局，最後在 1772 年執行了首度的波蘭瓜分。然而第一次波蘭瓜分對若干波蘭貴族而言，仍渾然不察國家存亡已迫在眉睫，僅在乎其長久以來所享有的特權是否取回及繼續維繫，也不啻預示了波蘭王政共和國的亡國僅是時間早晚的問題了。

同時，「負面波蘭觀」且隨著波蘭第一次瓜分而更深植於世人心中，尤其當普魯士官員接手新併領土行政事宜時，面對全境充斥著遭波蘭貴族凌虐的廣大農奴人口，不禁身感猶如置身奴隸國度般，當時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二世（大王）（Frederick the Great, 1740-86）據此而將波蘭人評為「全歐最落後的民族」、以及「每個層面皆低賤的民族」（Michalski, 1982: 39）。

此種對波蘭社會不假詞色的攻訐批判，甚至深入廣大的輿論界之中，從而出現所謂「波蘭式經濟」（*polskie gospodarzenie, Polnische Wirtschaft*）的負面形容詞。此一極度醜詆波蘭人的標語，首度見之於 1784 年的德意志學者佛爾斯特（Georg Forster, 1754-94）予友人的書信之中，其後廣為流傳於中西歐社會，該詞句之意係指整個波蘭社會係呈現一種懶惰至極、雜亂無章、愚昧不堪、粗俗不文、麻木不仁，甚而堪比豬窩的現象（Forster,

1978: 225)。由「波蘭式經濟」標語的廣為流傳，說明了波蘭負面形象至 18 世紀末葉之時，已然深入時人的認知之中，益使王政共和國的步向亡國難以喚起歐洲各國及輿論界的同情，於是 1793 年及 1795 年的波蘭遭受第二次及第三次瓜分，不過是為早已病人膏肓且普遭撻伐嘲笑的王政共和國，完成最後的蓋棺措施罷了。

陸、結論

綜觀一部縱橫馳騁於中東歐至東歐大陸上達數百載之久的波蘭—立陶宛聯盟，以及後續的王政共和國的崛興、全盛、中衰，乃至於最後的覆亡歷程，實可歸結出如后幾項重點探討之。首先波蘭國勢從 14 世紀開始的逐步走向興旺，乃至於 15-16 世紀的達於巔峰之境，甚至至 17 世紀的殘餘盛世餘暉，概括言之，皆與中央拉攏乃至於賦予地方頗大的自治權息息相關，其後此類地方勢力逐步發展壯大，進而成為地區貴族，而隨著波蘭及立陶宛各地的貴族在兩國數次的締盟中被結合為單一國度，即王政共和國的過程中，各地貴族就成為國會的主角及王政共和國主導力量，從而被外界稱為貴族的「黃金自由」，甚至直接將波蘭王政共和國喚為「貴族共和國」。

許多專業評論者常以波蘭貴族權勢過大並凌駕王權之上，認定貴族濫用「自由否決權」的一票否決全部的設計，從而導致此一國度最終步向覆亡之途，從而認定濫權亂政的貴族應為波蘭王政共和國最後的亡國，負起最大的責任。然而此說的成立，是建立在針對 17 世紀末期至 18 世紀的波蘭國度崩潰瓦解的觀察之上，卻全然無法解釋重要機構早已存在大量特權貴族的波蘭—立陶宛聯盟暨後續的王政共和國，何以反能使國勢在 15-16 世紀之期達到巔峰盛世？據此，實應更進一步深入觀察波蘭國度從 14-18 世紀間，貴族在其間所扮演的多樣化面貌。

事實上，誠如前面篇章所言，最初波蘭及立陶宛之所以會締結聯盟，主因在於為了共同對抗德意志騎士團國家，於是在此一過程之中，允諾騎士團國家內部土地貴族及城市市民階級許多特權，其後此一特權亦連帶賦

予了與騎士團國家相毗鄰的境內各地貴族，藉此收編對手臣屬的依附及邊地貴族對中央王室的效忠之心，終能在 1466 年『第二次托倫和約』中，藉由各地勢力之助而迫令騎士團國家稱臣入貢。其後波蘭王國乃將同樣的作法，運用於對南部及東部的羅斯人諸國度的經略治理之上，甚至及於東南方的哥薩克人地區，遂使波蘭—立陶宛聯盟暨後續的王政共和國的版圖，能在 15-16 世紀之時持續地向外擴張膨脹。而波蘭往往在向外擴張之際，武力征服並非唯一手段，更常倚賴者就是收編敵對政權的邊陲勢力，此際「自由否決權」的設計即發揮了很大的作用，這個在後世被攻訐咒罵為導致波蘭亡國的罪魁禍首制度，事實上在早期因具有保護弱小貴族不受勢大權大的貴族欺凌而備受讚揚，許多原屬敵對政權的邊陲地區貴族，正因為這項具有保護自身權益的設計而自願加入波蘭王政共和國，波蘭國勢亦因此而能漸形壯大，並終而走向 15-16 世紀中東歐東歐的獨霸地位。

與此同時，波蘭 15-16 世紀之時的宗教寬容態度，亦在其國勢擴張的過程扮演著不下於賦予貴族特權的角色。事實上，從 14 世紀後期波蘭—立陶宛聯盟建立開始，一直至 16 世紀兩者結合成為王政共和國之期，以賦予其許多特權來收編敵對邊疆小邦的過程中，聽任依附的各地小邦繼續維護自身宗教信仰自由，亦是波蘭版圖能夠逐步擴張的重要因素之一，從 14 世紀大批猶太人被召募入境、14-15 世紀在國境東疆所納入大批東正教信徒，一直到 16 世紀宗教改革之後西部領域出現了許多新教徒，波蘭國度都能兼容並蓄地接納之，致而能使波蘭王政共和國在 16-17 世紀，全歐各地皆深陷宗教戰爭煉獄的時代中，成為小康安逸的一方樂土，並被讚許為「沒有火刑柱的國度」。

正是透過對各地貴族大量特權的賦予及自身宗教信仰的維繫之後，方能使波蘭從 14 世紀末至 16 世紀在逐步擴張的歷程中，連帶著形塑出正面形象並廣為傳佈。其後雖在 17 世紀的進程中，因上述兩項特點逐步僵化下而對波蘭外在形象帶來衝擊，但隨著波蘭盛世最後一任英主楊三世·索別斯基對基督教歐洲所作出的鉅大貢獻，使得波蘭正面觀再次贏得了全歐輿論的焦點。

然而此種全歐高度正評的波蘭形象，卻在一進入 18 世紀之後短短 20 餘年間全面逆轉，貴族濫權下的國會失能及天主教走向狂熱下的宗教迫害，使得王政共和國無論內外方面，皆呈現癱瘓無能且偏執跋扈之態，遂使其國家形象在極短的時間內由正轉負，「負面波蘭觀」形象自此席捲全歐輿論界，再無扭轉之機，直迄其 1795 年的橫遭第 3 次瓜分而亡國為止。

綜上而論，不難看出波蘭全盛與衰亡，皆與中央其對地方政策及宗教政策密切相關，在早期因其兩項政策具有兼容並蓄的特色，因而能襄助波蘭國勢臻至巔峰盛世並博得正面形象，晚期卻也因兩項政策的失控，埋下波蘭慘遭瓜分亡國之禍及負面波蘭觀的泛流。維繫波蘭國度運作的兩項重大事務，在不同的時空環境卻得到截然相反的結果，在在說明了國家體制及政策必須要與時俱進地做出必要的修正，否則一旦陷入僵化停滯，過去的榮光可能遽轉而成為日後的災難，波蘭人國家從 15-17 世紀前期的絕代風華，最後卻步向 18 世紀的衰凌覆亡，誠為絕佳案例。

參考文獻

- 杜子信，2019。〈近代德波敵對下德意志騎士團國家史的政治工具化〉《成大歷史學報》56 期，頁 133-99。
- Boockmann, Hartmut. 1999. *Der deutsche Orden: Zwölf Kapitel aus seiner Geschichte*. München: Verlag C. H. Beck.
- Broszat, Martin. 1963. *Zweihundert Jahre Deutsche Polenpolitik*. München: Ehrenwirth Verlag.
- Conze, Werner. 2000. *Ostmitteleuropa: Von der Spätantike bis zum 18. Jahrhundert*. München: Verlag C. H. Beck.
- Friedrich II. 1981. "Die politischen Testamente der Hohenzollern," in Richard Dietrich, ed. *Die politischen Testamente der Hohenzollern*, pp. 202-203. Köln: Böhlau Verlag.
- Haffner, Sebastian. 1979. *Preußen ohne Legende*. Hamburg: Wilhelm Goldmann Verlag.
- Halecki, Oskar. 1963. *Geschichte Polens*. Frankfurt: Verlag Heinrich Scheffler.
- Higounet, Charles. 1986. *Die deutsche Ostsiedlung im Mittelalter*. Berlin: Siedler Verlag.
- Michalski, Jerzy. 1982. "Polen und Preussen in der Epoche der Teilungen," in Klaus Zernack, ed. *Polen und die Polnische Frage in der Geschichte der Hohenzollernmonarchie 1701-1871*, pp. 26-55. Berlin: Collquium Verlag.
- Rhode Gotthold. 1980. *Geschichte Polens: Ein Überblick*.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 Rogall, Joachim. 1996. *Deutsche Geschichte im Osten Europas: Land der großen Ströme von Polen nach Litauen*. Berlin: Siedler Verlag.
- Schreiber, Hermann. 1984. *Die Deutschen und der Osten*. München: Südwest Verlag.
- Seward, Desmond. 1972. *The Monks of War: The Military Religious Orders*. London: Eyre Methuen.
- Wessel, Martin Schulze. 2002. "Religiöse Intoleranz, grenzüberschreitende Kommunikation und die politische Geographie Ostmitteleuropas im 18. Jahrhundert," in Jörg Requate, und Martin Schulze Wessel, eds. *Europäische*

Öffentlichkeit Transnationale Kommunikation seit dem 18. Jahrhundert, pp. 63-79. Frankfurt: Campus Verlag.

Zernack, Klaus. 1999. “*Negative Polenpolitik als Grundlage deutsch-russischer Diplomatie in der Mächtepolitik des 18. Jahrhunderts*,” in Klaus Zernack, ed. *Preussen – Deutschland – Polen. Aufsätze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polnischen Beziehungen*, pp. 225-43. Berlin: Dunker & Humblot GmbH.

Zientara, Benedykt. 1982. “*Melioratio terrae: The Thirteenth Century Breakthrough in Polish History*,” in J. K. Fedorowicz, Maria Bogucka, and Henryk Samsonowicz, eds. *A Republic of Nobles: Studies in Polish History to 1864*, pp. 21-4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rom “Savior of Europe” to “Europe’s Most Backward N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olish State and National Image across Europe from the 14th to the 18th Century

Tzu-hsin Tu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ung-Cheng
University, Chiayi, TAIWAN*

Abstract

The Polish-Lithuanian Union from 1386 to 1696 dominated the politic in the eastern half of the European continent. In this process, through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all *szlachta* (nobles), and its tolerant treatment of various religions, gradually established its hegemony in the East Central Europe and Eastern Europe, making it difficult for neighboring countries to compete with it, its territory at its peak stretched from the Baltic Sea to the Black Sea. For this reason, by the fif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this country had successively won praises from all over Europe, such as “the country without the stakes,” “the Savior of Europe” and “the Conqueror of Turks.” It fully witnesses to the prosperity of this country at that time. However, after entering the early 18th century, the two key elements that had built Poland’s national prosperity in the past: the supremacy of aristocratic rights and the tolerance of religious beliefs had become rife and destroyed due to abuses over the past century, but they were also limited by the selfish interests of all parties. The failure to correct it in time eventually caused this country to quickly suffer serious blows at all levels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including military, political, religious and public opinion circles. In the end, the image of the Polish Royal Republic was shortened by just a few decades. The period turned from positive to

negative, resulting in the emergence of negative slogans such as “the most backward nation in Europe” and “Polish economy,” which became a clear symbol of this country toward national subjugation. This article will take the topic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xternal image of Poland-Lithuania and Polish Royal Republic, analyze the key to its transformation from positive to negative, and the underlying factors why it was difficult for this country to turn the tide and get back on track during the process.

Keywords: Polish-Lithuanian Union, Polish Royal Republic, Polish Golden Age, negative view of Poland

